

主持人语

贾妮思·佩克(Janice Peck),女,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兼研究生主任。佩克最早在犹他大学获得了传播学学士学位,接着在华盛顿大学获得了传播学硕士学位,最后又在加拿大的西蒙弗雷泽大学获得了传播学博士学位。在进入学界之前,她曾经担任过记者、编辑,也曾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为报刊、杂志以及广播电台供稿,另外她也出版过短篇小说。

佩克的主要研究兴趣:新自由主义人类学、媒介与传播史、媒介与文化研究、传播批判理论、电视研究与数字文化等。近些年佩克主要在批判理论、传播史、电视研究、大众文化的社会意义和政治含义、新闻社会学、阶级、种族与性别的媒介表征、美国政治和文化史方面进行研究与教学工作。其独著有《奥普拉年代: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文化偶像》(The Age of Oprah: Cultural Icon for the Neoliberal Era,2008)以及《电视福音:意义危机与宗教电视之魅力》(The Gods of Televangelism: The Crisis of Meaning and the Appeal of Religious Television,1993);合编有《危险时刻:二战以降的美国传播批判研究史》(A Moment of Danger:Critical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U.S. Communication Since World War II,2011)以及《传播史手册》(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History,2012)。

目前佩克的研究集中在名人慈善事业的文化和政治意义方面,包括社会创业、公益营销以及“慈善电视(Charity TV)”,同时她对教育改革政治学也抱有很高的热情。

本文选自《文化评论》(Cultural Critique),No. 48 (Spring, 2001), pp. 200-249,在国内尚为首发,回顾了2014年2月10日刚去世的斯图亚特·霍尔的思想历程,以志纪念。

主持人:张 亮(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思想的历程: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 以及悬而未决的文化与“非文化”的关系问题

贾妮思·佩克

(科罗拉多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美国 博尔德 80309-0065)

宗益祥 译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 斯图亚特·霍尔几乎就是文化研究的同义词。通过回顾霍尔的思想历程,可以大致把握文化研究的发展蓝图:先是从文化主义到结构主义、再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到后结构主义,最终一路发展来到了后马克思主义。霍尔的思想历程展现了文化研究试图解决文化反映论问题的不懈努力,而本文最终认同霍尔这种放弃文化唯物主义且又旨在超越经济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立论方式。

[关键词]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思想历程;文化;非文化

[中图分类号] 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82(2015)01-0021-22

收稿日期:2014-12-03

作者简介:贾妮思·佩克(Janice Peck),女,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兼研究生主任。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与发展研究”(10BZX003);

教育部重点研究重大项目“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研究”(10JJD710010)

译者简介:宗益祥(1989-),男,安徽天长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英国文化研究、传播思想史。

这篇文章的题目受到了《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对萨特的一次访谈的启发,萨特在访谈中回顾了自己的思想发展(“历程”)。笔者还要感谢丹·席勒(Dan Schiller)、尤其还有比尔·赖尔登(Bill Riordan)对此文雏形的许多重要点评。

1992年,在阿隆·怀特(Allon White)的追悼会上,斯图亚特·霍尔颂扬了这位故友在“转换隐喻”(metaphors of transformation)方面的重要贡献,因为这种转换“对于激进想象而言具有一种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在霍尔看来,这种依据“革命时刻”、涉及马克思主义的隐喻“不再强求一致。”霍尔主张,不必为这些失效的隐喻而悲叹,因为文化研究正在“迅速移离这种戏剧式的简单因素与二元对立”的隐喻方式,它需要一种“构想文化政治学”、虑及“‘社会’与‘符号’之关系”的崭新隐喻。^[1]287-305或许霍尔已经回顾了自己的思想历程,并且开始致力于这种埋葬陈旧隐喻的事业当中了。霍尔思想中的这种大逆转与文化研究(“霍尔”几乎就是文化研究的同义词)领域的理论历程几乎是齐头并进的。目前来看,霍尔“主要是负责发展和接合文化研究的理论位置”^[2],他的作品提供了一幅文化研究的路线图,即从文化主义到结构主义、再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到后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霍尔旨在解决一种文化的反映论问题而利用上述思想体系,而本文则以一种批判性的视角来对此思想历程进行一种追踪与评估。笔者赞同霍尔的解决方式:文化研究最终必须放弃这种文化的唯物主义理论,与此同时还要保留一种旨在超越经济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立论方式。

文化的反映论问题

文化研究基于这样一个信念:文化必须透过自身术语以及它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非文化”)的关系来加以理解。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该领域的两大“奠基人”就开始思考上述关系问题。在出版《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的前两年,E·P·汤普森(E.P.Thompson)对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一书进行了回顾。在对威廉斯的作品大加赞誉的同时,汤普森还认为威廉斯尚不能满足其“研究全部生活方式的各种元素之关系的文化理论”的诉求。^[3]汤普森还指出了这本书的两个

方向性错误:其一,它走向了一种“文化等于社会(culture equals society)”的危险境地;其二,它将文化与政治、经济隔绝开来,没能建立一种“根据它们彼此构筑的关系系统的立论方式”。^[4]汤普森反驳认为“任何文化理论必须包括文化与非文化二者之间的辩证互动”,据此他开出一剂良方:“我们必须假定生活经验的原材料是处在一个极端上的,而所有极其复杂的人类学科与系统、结合与非结合,以正式方式形成体系或者以非正式方式进行分散,这些则是在另一个极端上对上述原材料进行了一种‘处理’、传递或者曲解。”^[4]尽管这两位奠基人后来都被置于“文化主义”的旗号之下,但他们二者之间的差异还是显而易见的。在汤普森看来,文化与“非文化”的领域是凭借经验进行划分的,然而威廉斯则寻求将文化视作是一种具有社会总体性的整体概念——后来他将此称为“不朽的整体实践(whole indissoluble practice)”。^[5]实际上,他在回顾《漫长的革命》一书之时指出:“试图发展一个社会总体性理论……寻找一种尤其是可以研究作品与时期之结构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连接并阐明特殊的艺术作品形式,但也形成并连接着一般的总体社会生活。”^[6]

在探讨文化与“非文化”、文化与社会总体性的关系问题之时,汤普森与威廉斯无疑显露了这种“反映论”的问题——西方思想对于文化的主导理解是将其视作是一种这种对原始精神或者物质进程的反映。在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力场的对话当中,这种反映论版本是在第二国际内部兴起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这被许多欧洲共产党所欣然采纳,并且这在第三国际以及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变得牢不可破。^①这种“凝固化和单一化的马克思主义概念”^[7]将生产力发展状况视作是考察一切社会问题的“基础(base)”。而包括文化在内的所有其它方面的存在则被归入了“上层建筑”,并且还将“上层建筑”视作是对于经济基础的一种反映,而经济基础则被视作是一种自主的、自决的和绝对的存在。^②

① 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批评可参见阿拉托(Arato)、克莱蒂(Colletti)、雅各比(Jacoby)。然而这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后来与斯大林主义较为一致,它灌输了欧洲共产党在20世纪早期到中期的思想;正如贝特尔海姆(Bettelheim)的文献考证已经指出的:甚至托洛茨基(Trotsky),这个被誉为斯大林的对立面的典型人物也持有这种观点。在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中,只有列宁反对这种马克思主义解读方式,并且将其命名为“经济主义”。

② 因此这种“自发的马克思主义(automatic Marxism, Jacoby)”将生产的社会关系调入了上层建筑之中,但对于马克思来说,它已经恰当地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Marx, 20)。这种将生产的社会关系降低到上层建筑的结果就是使得阶级斗争成为了一种上层建筑的现象——这个问题在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斗争”概念之中得到了保留。

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 汤普森与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领域一改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的文化反映论。^[8]他们并非孤军奋战。实际上, 自卢卡奇以降, 许多聚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大旗下的学者也在探讨这种潜藏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模式当中的反映论问题(比如, 布洛赫、布莱希特、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葛兰西、萨特、古德曼)。正如马丁·杰(Martin Jay)所指出的, 尽管这些思想家存在诸多差异, 但是他们在“彻底抛弃第二国际的遗患”上面达成了共识, 并且都全神贯注于扮演一种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之外的“文化批判的角色”。^[9]因此,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在不断努力反思上层建筑概念和反映论问题——霍尔及文化研究学者则是这项工作的继承者。

文化研究的继往开来

霍尔曾在《文化研究: 两种范式》(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一文中指出了反映论的核心问题。在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十年主任生涯(1969-1979)作别不久, 霍尔发表了这篇文章, 此文被视作是通过对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二者交叉领域的基础进行探究进而指明了文化研究领域的未来。文化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是汤普森、威廉斯以及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 他们被认作是承继并修正了阿诺德—利维斯式(Arnoldian/Leavisite)的文化视角, 也即是产生并展现人类生存的意义、传统和实践的新成分扩入其中。结构主义者(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巴特以及阿尔都塞)同样将文化视为意义, 但是他们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这里的意义[更确切而言是意指(signification)]并不被视作是源自人们的主观经验, 而是源自一种先于并决定个体经验的客观符号系统。对于结构主义者而言, 经验并不是意指的原因, 而是其结果。由是观之, 结构主义者的反人文主义倾向与文化主义者的人文主义倾向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碰撞。

霍尔注意到了这种张力的同时也指出了将它们进行结合的关键点: 二者都面临重要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 并且它们都强烈地抵制反映论。假如每种范式都是“一种与经济基

础/上层建筑的隐喻进行彻底决裂”^{[10]57-72}, 并且“如果这里有错误的话, 那么它们就会持续不断地对其进行回应”; 在霍尔看来: “它们对下列一个问题的坚持是正确的——该问题恢复了所有的非还原确定性难题——它是重中之重; 而且这个问题的解决将文化研究的能力转向取代唯心论与简化论二者的无尽摆动上来。”^{[10]57-72} “不同实践的特性以及由此组成的接合整体的形式”是一个“核心问题(core problem)”, 霍尔暗示对上述两种范式的结合或许会提供一种理解该问题的方法。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结合是未来文化研究的关键, 因为它们“尽管方式完全不同, 但是都面临着条件和意识的辩证法”, 并且都“提出了思维逻辑与历史进程‘逻辑’二者的关系问题”。^{[10]57-72}

十年后, 霍尔依据文化研究的起源来重新考虑该研究领域的未来。此时他认为文化研究事业“起源并发展于对一种必然的简化论和经济主义的批判上——并且我认为这种简化论和经济主义并非外在于而是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的; 围绕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产生了一种论争, 据此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和庸俗马克思主义者都试着思考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问题。”^{[11]277-294}

早期学者力求把握文化和社会总体性二者的辩证关系, 但是如今霍尔认为这似乎显得天真而贫乏: “这里时常涉及到一种文化介质的偏向问题, 比如语言、文本性、意指, 这些东西常常直接或者间接地避开与其它结构进行连接。”因此, “在文化研究理论领域之内, 想要获得任何一种类似文化关系及其效果的东西都是不可能的。”文化研究学者必须学会接受这种“文化的置换”, 并且它“自身无法与其它问题达成和解, 这种其它问题也永远无法被批判的文本性所全然覆盖。”^{[11]277-294} 在这十年间, 理论研究的术语已然改变了。在纪念怀特之时, 霍尔并未提及“条件和意识”的辩证关系, 而是看到了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 即“社会和符号的关系, 权力和文化的‘游戏’”^{①[1]287-305}。因此, 文化研究看起来明显经历了一种问题式的重构。实际上, 霍尔将这种“转化隐喻”的经过描述为一种“文化理论的彻底‘转向’”。^{[1]287-305}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思想的转变哪? 文化研

①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是霍尔的学生, 他是美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格罗斯伯格也将文化研究的任务定义为发展一套有关文化和权力的理论(Cultural Studies vs. Political Economy)。

究学者的普遍回应是文化研究已经超出了那种关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关系的初创范式。在霍尔看来,这种理论演化预示着“我们正在进入后马克思主义时代”。^{[11]277-294}这种立场在其它地方也得到了回响。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认为文化研究正在超越政治经济学(进一步而言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简化论和反映论”^{[12]72-81},即认识到了经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而难以描述的”。^{[12]72-81}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认为“从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反对简化论和经济主义的激进研究方法的浮现开始,似乎这‘两种范式’就与马克思主义一同出现了。”^[13]“作为整体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她暗示道,“已经‘无法继续用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来描述当下的研究模式了。’”^[13]伴随着“后马克思主义”的粉墨登场以及“宏大理论”的分崩离析,文化研究获得了一种“更高程度的开放性”^[13]。

与此相反,也有批评者将这种思想转变视作是一种大倒退。科林·斯帕克斯(Colin Sparks)就主张这种转变正在丧失文化研究旨在“理解文化决断”的初衷,文化研究已经选择了“一种本质上的本本主义者的思路”^{[14]71-101}。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认为文化研究已经选择将政治踏入文学领域或者将它们“最大限度地彼此隔离开来”。这两条路线都回避了“生产模式和市民生活与文化形式”以及“市民生活与文化本身”的关系问题。在史密斯看来,“文化研究仍然处于将经济、市民社会与文化领域视为彼此分离的阶段”^[15]。这种分离分析的结果就是丧失了文化研究领域的批判性实践:“由于这些领域的分离,文化研究就无法理解下述问题:文化研究自身能够有效提出的唯一目标就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生产的总体性。实际上,如果没有这层认识,文化研究必然被人们彻底谴责为一种更加资产阶级化的知识生产形式,因为它反映了上述领域的分离,而这是资本主义话语监控的一种绝望的努力。”^[15]

丹·席勒(Dan Schiller)也对文化研究的下述倒退提出了批评:文化研究不再思考传播、文化与社会总体性之间的关系了——他认为这种趋势使得传播研究史在大体上陷入了困境。对于席

勒来说,这种趋势源自传播理论当中的一种心物分离的二元论,或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结果导致了一种“永远无法对二者进行综合的无能,或者甚至难以将‘劳动’与‘传播’二者在一种单一概念的总体性范围以内进行囊括”^{[16]14}。

上述三种批评论调都将矛头指向一处:文化研究放弃了文化与“非文化”二者之间关系的唯物主义理解——换言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背离。斯帕克斯和席勒将这种倒退视作是文化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的结构主义转向的结果。在斯帕克斯看来,鉴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是在对巴特、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的推崇之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因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则在文化研究领域大体上获得了一种正统的地位。随后文化研究就从阿尔都塞自身的弱点当中走向了一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道路。^{[16]71}席勒同样指责文化研究的结构主义转向,认为这使得意指与其余的实践活动隔离开来:“它与其它的生产过程分离,意指——这被誉为一种‘现实的积极的社会力量’——逐渐转变为一种自主生成原则(self-determining generative principle)”。^{[16]153}因此,“生产的全过程被严重削减了,对于威廉斯等挑战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经典模式的人而言,生产的全过程仍然是至关重要的。”^{[16]153}

斯帕克斯评论道:“今天在文化研究领域中的主导观点或许就是褪去马克思主义这张皮,因为文化研究自身已经能够对当代现实问题的文化分析进行阐述”。^{[16]98}实际上,许多文化研究者似乎欣然放弃了这种过时的理论框架,并且对那些还在束缚自身的东西心生厌恶。^①其中的涵义就是文化研究最终已经超越了唯心主义和还原论,并且它解决了曾被霍尔视为“关键问题”的“所有非还原确定性问题”。这恰恰就是我想要质问的假设。我也认为文化研究的思想轨迹永远打上了20世纪70年代所采用了“结构主义范式”的印记,据此它反击了文化反映论。在霍尔的领导下,文化研究者们试图利用文化与“非文化”的分离来解决这种文化反映论问题——这是一种结构主义赋予的语言形式对实质、偶然性对必然性、共时性结构对历时性发展的特权所促发的转

① 注意格罗斯伯格反驳加纳姆(Nicholas Garnham)一文的标题为证:《文化研究 VS 政治经济学:还有其他人厌倦这场论争吗?》(Cultural Studies vs. Political Economy: Is Anyone Else Bored with This Debate?)

变。文化研究对于结构主义的推崇决定了随后经由阿尔都塞和葛兰西引入的马克思主义得以流行。这种对于结构主义的采用——带有一种明显的索绪尔基调——文化研究的蓝图在本质上容易受到这种具有反稳定性(destabilization)的后结构主义对上述索绪尔基调之批评的破坏。霍尔的思想历程经历了从旨在理解“条件和意识的辩证法”^[10]到承认根本无法“获得那些对文化的关系和效果的充分说明”^{[11]284},这反映在文章当中就是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向。该文章的一个致命伤就是文化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做个保证。

与上述观点相反,有人认为这种思想轨迹的转向构成了一种理论进步,而我则主张这种论调只不过是老调重弹。霍尔对文化反映论问题的解决——使得文化具有自主性——不仅保存了反映论和自主性的二元论,而且保存了“非文化”的自主性,一般来说,“非文化”就成为了“基础”或者“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经济主义的显著特征就是一种自主经济或自主基础,因此霍尔将这个从一开始就在文化研究领域盘旋的特殊幽灵保存下来。笔者认为对这种文化反映论问题的克服包含着拒绝文化与“非文化”的分析式分离以及此二者的自主性,进而从事一种长期搁置的对“基础(base)”这一概念的研究工作。

文化研究的结构主义转向

二战以降,社会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的人文主义思潮在欧洲兴起,而文化主义则应运而生。文化主义从马克思的早年作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当中提取了一种理论依据。1932年,马克思的这部早年作品在德国被人发现进而得以正式出版,紧接着法国也于次年出版了该书,而该书的英文版则是在1959年才得以出版,随后通过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对该书的大力引介,包括霍尔、汤普森等人在内的英国新左派学者得以一睹风采,而后来霍尔与泰勒还一起担任了《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的编辑。^[2]阿里·雷坦塞(Ali Rattansi)就此评论道,“他们强调对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人类异化(alienation)状况的批评,积极关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本质

(essence)’得以解放的可能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供了一种改变经济主义的方法,而这种经济主义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甚嚣尘上。与斯大林主义的生产力特权相比,马克思的早期作品“力求将人类劳动力解释为一种自我创造性的行为,这就仅仅将生产技术的发展视作是一瞬间的事情”。

在威廉斯和汤普森看来,他们强调这种具有本质作用的人类创造性在历史文化进程当中的中心地位。鉴于对将文化和意识视作是经济生产力的直接反映的反对,他们力求恢复实践在历史当中的地位。正如汤普森指出的,“这是一种能动过程——同时人类据此过程得以创造历史——而这正是我所一直秉持的观点”。^{[17]24-33}威廉斯也批评这种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问题,因为“艺术降格成为一种对基础经济和政治进程的纯粹反映,因而艺术就堕落成为了寄生虫。”在威廉斯看来,“人类的创造因素是自身个性与外在社会的根源;它既不能被艺术所限制,也不能被政治决策和经济生活的系统所排斥”。^{[17]115}

假如说文化主义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础的话,那么正如霍尔所言,这种霸权“随着‘结构主义’在学界的登陆而被打破了”^{①[17]64}。正是在霍尔的领导下,结构主义在文化研究领域获得了自身的范式地位。与文化主义一样,结构主义也涉及到反映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元公式的问题。在《野性的思维》(The Savage Mind)一书中,列维·斯特劳斯特认同“经济基础具有无可争辩的首要地位”,然而这是旨在发展“马克思几乎从未谈及的上层建筑理论”。^[18]巴特的《神话学》(Mythologies)利用了索绪尔的符号学来“详细阐明这种将小资产阶级文化转变成为一种普遍本质的神秘化(mystification)”。^[19]阿尔都塞通过他的“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 of the superstructures)”概念来改变经济主义,并且主张一种“上层建筑的特殊功效理论(theory of the specific effectivity of the superstructures)”,并且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有待详述的”。^{[20]113}实际上,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已经将这种结

① 这种陈述有点儿误导,仿佛法国结构主义与威廉斯和汤普森的作品是同时诞生的。结构主义在英国登陆比较晚的原因是它的一些重要文本的翻译较为迟缓,并且英国知识分子的岛国偏狭性使得他们长期被经验主义主导,因而对一切法国事物心存疑虑。

构主义蓝图的特性概括为“上层建筑研究,或者更简略而言就是意识形态研究”^[21]。

结构主义利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挑战了反映论。索绪尔的卓越贡献在于他破除了我们先前对于语言的错误观念:“语言是对于预先存在的意义或者心灵印记的反映或者表现,它是一种以物质的方式对某些非物质的东西的再现”,这种再现是通过提出一种语言的关系(relational)理论而非实体(substantialist)理论来进行的。^[22]⁴借助符号来反对一种所谓认知状态的预先世界(prior world)的存在,索绪尔主张词语与思想是在语言系统当中共同产生的,这种产生过程是依据差异和组合的原则进行的,它是将形式同时加诸思想与物质之上。在索绪尔模式当中,语言是一个封闭的符号分类系统,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关系通过二者的不变代码进行接合,即将每一个不同的能指分配给每一个独特的所指。这种代码需要各种元素之间的差异和重组,依据构造的严格规则,这种构造原则的公式则组成了语言的“结构”。因为需要使用语言,那么一位言说者就必须通过元素之间的差异来确定某一个特殊元素的特性,索绪尔认为一个语言系统常常是已然完整的——这是一种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共时性总体”^[22]⁶。在索绪尔模式里,意义并不是一种意识的或者事物的特性,而是一种接合的形式图式的效果,即它决定了元素是如何彼此区分进而相互组合的。因此,符号与指示物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换言之,这并不是事物的一种反映),符号的显性内容(包括观念和语音实体)隶属于它们在语言结构[语言(langue)]当中作为实用价值的功能,即组成了实际的语言使用[言语(parole)]可能状态。因此,索绪尔认为“语言本身只是一种形式而非实体”^[22]¹²⁰,它“只包含差异关系而非肯定关系”^[22]¹¹⁸。

法国结构主义是通过将索绪尔的语言概念“大力阐释”为形式(form)而非实质(substance)的方式得以产生的。对索绪尔语言学的一些重要原则的使用——比如语言学中的结构概念(structure)、语言的非写实模式(nonrepresentational model)、符号的任意性学说(arbitrariness)、不太关心语言的指涉维度、关注语言(langue)和共时性(Synchrony)胜于言语(parole)和历时性(di-

achrony)——结构主义将这些原则运用于文化和社会研究当中,而此举在人文学科领域的意义无疑是深远的。假定索绪尔的语言结构概念是社会研究的总体蓝图,那么结构主义者就会指出:可以将人类实践的多样性理解为“结构代码规约下的意指系统的不同接合”^[22]⁴。因此,从诸如亲属关系到饮食习惯、从神话到文学都可以被视为这个同样的总体原则的显露。尽管形式对实质具有优先性,结构主义将语言视作是“思想、科学和哲学的特权对象”,视作是“人和社会历史的‘关键’”,以及“接近社会运行规律的方法”^[23]⁷³。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指出:“语言科学知识投射在社会实践的总体上……据此奠定了一种探究广阔的人类活动领域的科学方法基础。”^[23]⁴结构主义的重心在于个体们的活动“沦为语音材料的层级”^[23]⁴。也即是说,个人行动是任意的——不带有自身的实际意义——因为它们的意义是通过在预先存在的接合模式当中刻制的。因此,结构主义者认为人类是“被结构言说的”。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现代语言学以及发生了语言学转向的人文学科的命运是被索绪尔决定的,因为他自开山以来就将语言区分为‘外在(external)’元素与‘内在(internal)’元素。”通过将自主性引入语言当中,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使用了一种意识形态效果”,即通过“将语言工具与生产、使用它的社会条件分割开来,从而将自身呈现为一种最自然的社会科学”^[24]。结构主义者大都持有上述的批评观,据此他们在两个方面从事相关活动:先通过将语言与其余社会历史存在进行理论分离以便进行科学分析,然后再将语言的操作规则再反向投射到“社会实践的总体上”。唯有通过这种预先分离的方式,语言才能成为“进入社会运行规律”的特权模式。语言的特权总体是对于意义的一种历时性理解的贬抑,即主张意义全部源自一种共时性系统的运行。由此观之,历时性沦为了一种没有意义的纯粹重复——它只是一些“不连续的序列结构”^[22]⁷。因此,结构主义者对于任何历史必然性概念的拒绝使得他们赞同“不可简化的偶然性”^①^[25]。在索绪尔的阴影下,结构主义者以结构(静态系统的内在关系逻辑)取代历史(暂时发展)并将其

① 福柯在其结构主义“考古学”阶段的作为一系列离散知识的历史概念,或者在其后结构主义阶段的作为没有必然联系的话语和权力的连续总体的“谱系学”模式,这些是历时性贬值的结果。

作为研究方法与对象——此举为放弃马克思主义铺开了道路。

鉴于文化研究寻求一种非反映论的文化概念,因而结构主义的理论诱惑无疑是贫乏的。在斯帕克斯看来,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是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就引入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这既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而且比任何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严肃讨论都来得早”^{[14]81}。从1969年到1971年,文化研究中心开始努力“寻求一种替代性的问题式和方法”,这其中就包括了诸如“现象学、符号互动论、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14]81}。对该时期的理论重估与霍尔升任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相一致,这标志着文化主义范式的主导地位开始被动摇。这种转变在霍尔的“两种范式”的评价当中得到体现,在文中霍尔支持这种将“经验(experience)”视作一种结构效果的结构主义文化观,就结构主义的“结构整体的必然复杂性”概念与文化主义的“表达因果关系的复杂单一性”概念而言,霍尔对前者的推崇胜于后者,^{[10]68}而且霍尔认为前者的方法论的优越性在于“它切入了现实的复杂性当中”^{[10]67}。

霍尔对列维·斯特劳斯的处理表明了他对结构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接受。“语言学范式”,霍尔指出,让列维·斯特劳斯处理文化的方式“不只停留在它与实践内容相符的水平上,而是处在它与形式结构相符的水平上”,并且“将‘文化’视为思维和语言的范畴和框架,据此不同的社会类型则来自于它们的不同存在状况当中。”进一步来说,列维·斯特劳斯“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和实践可以让上述范畴及精神框架得以生产和转化,并且这主要还是通过模拟语言(最重要的‘文化’媒介)自身的运作方式来实现的。”对于霍尔而言,列维·斯特劳斯“通过生产意义范畴的方式来强调各种内在关系”,这就提供了一种新的将文化与“非文化”的关系进行概念化处理的方式——据此“一种确定性的因果逻辑被一种结构主义的因果关系排除了——这是一种约定的、内在关系的、结构以内各部接合的逻辑”^{[10]65}。

然而在霍尔看来,结构主义只是在文化研究领域具有某种理论影响,当然他也认同“结构主义是一种对后来发生的所有事情进行着色和影响的干预形式”^{[26]29}。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下,霍尔及其文化研究中心开始从意义(meaning,作为人类的活动)转向意指(signification,作为语言的运

作)。“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模式是霍尔的媒介话语的概念基础,正如霍尔在1989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这反映了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开始对文化研究产生了影响。”编码/解码模式也“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存有异议,对于诸如将意识形态、语言和文化视作是第二属性的,即将其视为被社会经济过程决定的而非自主设定的概念表示不满。”^[27]从语言操作的观点来理解意指使得霍尔将媒介“意义和信息”描述为“一种借助话语横组合链中的符号操作并且在‘语言规则’以内形成的特殊组织的符号工具,这就像传播或者语言的所有形式那样。”^{[28]128-138}霍尔认同语言系统先于并且决定着“现实(real)”的观念:“许多事件的意义只能在电视话语的视听形式当中得以呈现。当某一历史事件在话语符号之下传递之时,这就受制于那些使语言可以表意的所有复杂且正式的‘规则’”^{[28]129}。因此,霍尔认为,话语并不是“对‘现实’的‘透明’呈现,而是通过‘符号操作’来对知识进行建构。”^{[28]129}

霍尔的“新闻图像研究”一文明显受到了列维·斯特劳斯和巴特的影响。承接巴特的“图像修辞学”,霍尔研究了“使得意义成为可能的符号”^{[29]176},从而识别出“那种通过选择机制功能将世界进行分类的潜在‘深层结构’”^{[29]186}。这种将意指视作是为‘原始材料(raw events)’^{[28]129}分配意义的知识建构过程的观点在霍尔的《文化、媒介和“意识形态效果”》(Culture, the Media and the “Ideological Effect”)一文中再次出现。^[30]因此,结构语言学的基本原理——意指纯粹源自系统内的各元素的形式接合——这被引入文化研究领域并且进而在媒介研究当中得以运用。对于霍尔来说,结构主义方法的价值在于可以建立一种“非还原主义”的文化理论,该方法可以“研究符号和表征的系统”;它“强调文化的具体性和不可还原性”,^{[26]30}这与“人本主义理论”完全不同。^{[26]31}霍尔认为:“结构主义迫使我们不得不去真正反思这种作为实践的‘文化’:思考意指的物质条件及其必要”。^{[26]31}这里使用了“实践”和“意指的物质条件”的语言,据此我们突然发现了阿尔都塞对于霍尔思想的影响。尽管列维·斯特劳斯向往一种“上层建筑理论”,巴特也将符号学的目光转向意识形态,但是唯有阿尔都塞是在文化研究领域内将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合二为一。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在霍尔的指引之下,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开始发生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转向。^①斯帕克斯认为尽管文化研究在突入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也研究了一系列思想家,比如卢卡奇和萨特,但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1973年取得了该领域的“正统”地位。^{[14]82}阿尔都塞在《致马克思》一书中有“关于矛盾和过度决定(On Contradiction and Overdetermination)”的一章内容,这简直就是为霍尔而作的,但后者直到1983年才盛赞“该章理论概念的丰富性”,并且认为此文的价值在于已经开始“思考没有被简化为单一整体的各种复杂的确定性问题”。^[31]阿尔都塞之所以能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英国文化研究领域荣获巨大声誉,这是因为他提供了一种可以将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进行合并的新思路,而这代表了当时人文社科领域的最前沿。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是反对经济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它提供了一种可以洞悉“当下的不透明性(the opacity of the immediate)”的哲学基本原理及方法。^{[32]16}阿尔都塞对于经济主义的批评遵循其由一种由“内部整体原理(one principle of internal unity)”驱动的黑格尔主义的社会总体性概念的反对。^{[20]182}因此,他抛弃了一种黑格尔主义的“总体表达(expressive totality)”概念,即每一个元素都是对某个单一原理的显示或者反映。阿尔都塞将斯大林主义视为这种谬误的变体——这里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一般矛盾”成为了作为一种反映现象的上层建筑的单线“原因”。然而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将自己视为是与斯大林主义针锋相对的,不过在阿尔都塞看来这也只不过是黑格尔主义的总体表达错误的翻版:人本主义使得“异化”(及其“否定”)成为整体的单一原理。

阿尔都塞对残留于斯大林主义和社会人道主义中的黑格尔主义进行批评——确实,他的全部计划正是为了发展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可以将这种努力理解为是在黑格尔范围之外对于决定问题的反思。在克里斯多夫·诺里

斯(Christopher Norris)看来,阿尔都塞是借助于斯宾诺莎(Spinoza)来终结黑格尔的:“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计划归根结底就是用斯宾诺莎反对黑格尔,他呼吁用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来抵抗各种黑格尔主义的残留,比如阶级意识、异化、‘因果表达(expressive causality)’等等。”^[33]斯宾诺莎和阿尔都塞发展出了“结构因果(structural causality)”这一概念,这意为“社会总体性包含了不同层级的接合全体……比如包括经济基础、政治-法律以及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在内。”^{[34]6}尽管每一个层级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和功效,但是它们也被上述所有三个例子的实践总体所决定。因此阿尔都塞反对这一命题: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纯粹现象”,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呈现现象。^{[20]100}阿尔都塞提议去除这个“曾经预先给定的结构上的复杂整体”^{[20]199},在这其中“组织形式和复杂性的接合恰恰构成了该整体本身”^{[20]202}。

因此,阿尔都塞用“过度决定(overdetermination)”这个概念来取代黑格尔主义的单一决定,在前者那里“具体的变化和一种诸如社会形式的结构复杂性的变化”^{[20]209}被理解为“复杂地-结构地-非平衡地决定的”^{[20]209}。然而,一种社会形式并不只是“所有例子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等式”^{[35]113},而是“一种结构主导的接合形式”^{[20]202}。某一层级在每个社会形式当中居于主导性,并且生产形式决定了何种层级占据这一位置。因此,在它“于社会形式的所有例子之间分配效用”的范围以内,经济基础仍是决定因素(“最后的例子”)。^{[35]114}假设这些不同‘层级’具有一种“相对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那么这就需要将它们之间的关系放在反映论的限制之外进行考察,正如阿尔都塞所言:“马克思已经给了我们‘该链条上的两个结点’,并且已经告诉我们要去搞清楚在它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一方面,最后一个例子是由经济(生产模式)决定的;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和特定功效之间具有相对自主性。”^{[20]111}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这是文化研

① 文化研究中心在1971年的报告当中指出它“选择了一个连贯的理论……这是卡尔·马克思此前从未分析过的”(cited in Sparks, 81)。同年,该中心发起了一个名为“定位马克思(Situating Marx)”的座谈会,这受到了大卫·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的《马克思大纲》(Marx's Grundriss)的启发,这里的《马克思大纲》首次提供了马克思在1857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手稿的部分英译文本。此次座谈会的许多论文最后收录于《定位马克思》(Situating Marx)这本文集当中,保罗·沃尔顿(Paul Walton)和霍尔担任主编。

究的中心——源自结构主义的一个理论前提：一个给定的活动领域可以通过其内在逻辑和关系进行分离和检查。实际上，他认为“这是因为每一个层级具有一种能被客观视作‘部分整体(partial Whole)’的‘相对自主性’，并且这成为了相对独立的科学研究的对象。”^{[34]6} 斯宾诺莎区分了“想象的知识(knowledge of imagination)”在实际经验当中产生的前反思与常识意识”和“充足的知识(adequate knowledge，通过批判理性的正确使用来获得)”或者“理解”之间的区别，据此阿尔都塞声称“要对科学和意识形态进行严格的区分”^{[34]22}。然而意识形态包含着“表征、图像、符号等等内容”^{[34]26}。意识形态的总体意义并不是源自某一个元素(内容)，而是源自这些元素之间的内在组织和关系(形式)：“考虑到分离(符号和表征)无法构成意识形态。正是它们的系统性、排列与组合的模式才给予它们自身的意义；正是它们的结构决定了它们的意义和功能”^{[34]26}。这种功能是社会再生产：“确保人们之间的契约符合他们存在形式的总体性，个体与其任务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社会结构进行分配的。”^{[34]28}

意识形态对“每一个社会位置被其社会结构决定的人来说都是不透明的”^{[34]28}，因为正是潜在的结构原则决定了图像和表征得以进行选择和组合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意识形态“呼唤(hail)”或者“质询(interpellate)”(也就是“生产”)了社会主体，就在每个主体那里就如同在自然而然的“自由”思想那般。因此，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呈现的东西并非主导人们生存的真实关系系统，而是人们对生活其中的真实关系的想象图景罢了。”^[36]这样看来意识形态就是形式胜于内容，它是永恒的与超历史的。可是，结构也可以作为“客观研究的对象”^{[34]26}。因此，就像列维·斯特劳斯拉力求创造一门科学，借此人们可以认识到潜藏在文化实践的表层变体之下的永恒“宇宙法则”那样，阿尔都塞也想建立一门产生于特定的历史变体之中、研究意识形态的客观结构的科学知识。这种知识是通过概念理清或者内在批判的方式获得的，而这些知识再通过建立“想象与真实之间的差异”来转化成为政治实践。^{[32]17}

这种批判理清或者“理论实践”构成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政治计划。对于阿尔都塞而言，“实践”是“将一定的原始材料转化为一定的产品的全部过程，这种转化是利用具有一定生产方式的人类劳动发生作用的。”^{[20]166} 实践也分“层级”：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位于理论实践的层级，它“研究其它实践给予的原始材料(表征、概念和事实)，无论这些材料是‘经验的’、‘技术的’或者是‘意识形态的’”^{[20]167}。在这个层级，“生产方式”是采取的各种概念，方法则是使用概念的方式，而产品则是知识或者科学真理。阿尔都塞认为：“去了解就是用理论生产(理论和方法)的方式加诸原始材料进而生产了对象的充足概念。”^{[34]15} 理论实践或许能通过建立“‘两种不同水泥’的同一性从而促成政治实践：作为知识的‘思想水泥(concrete-in-thought)’，还有就是作为其对象的‘现实水泥(concrete-reality)’。”^{①[20]186}

在将霍尔介绍为美国学界之时，格罗斯伯格(Grossberg)和斯莱克(Slack)强调了“‘阿尔都塞时期’在文化研究进入结构主义领域的重要性”^[37]。从该领域诞生了被霍尔称之为媒介研究的“批判范式”，该范式“从内容转向结构或者说从显示意义转向符码层级绝对是一大特色”^{[38]71}。在霍尔看来，这种“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构成了媒介研究其中的一个“理论革命”，“而这种变革的核心则是意识形态、社会、语言的政治意义、符号和话语政治学的再发现”^{[38]89}。假如“阿尔都塞时期”标志着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转向，那么它也就包含了结构主义的基本原理：语言/文化并非实质而是形式。文化并不是表达或者经验的内容，而是符码、目录和分类(也就是组织原则)，即它只是提供了思考/意识的框架基础。因此意义——包括活动和组织过程的产物——是文化分析的合理对象。

在《“意识形态”的再发现》(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一文中，霍尔指出“废黜了语言的指示概念”，结构主义已经彻底表明“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并不包含或者给出它们自身的、完整的、单一的、固有的意义。”甚至，可以说“这个世界也只

① 对于阿尔都塞来说，“生产具体知识的过程全部发生在理论实践领域”(For Marx, 186)。尽管许多评论家指出阿尔都塞是经济主义者和还原主义者，但是这还是免不了使他容易遭受唯心主义指控的侵害。就经济主义者而言，可参见朗西埃(Ranciere)和格鲁克斯曼(Glucksmann)的相关论述；就还原主义者而言，可参见汤普森(Thompson)的相关论述(Poverty)。

是通过语言和符号化被给出意义的”，而语言和符号则是“意义得以制造的方式”^{[38]67}。因为除了语言之外我们无法接近“真实”，并且“社会关系唯有借助言说才能获得意义”^[39]，因此这就印证了那句话“在什么社会环境下做什么事儿(how people will act depends in part on how the situations in which they act are defined)”^{[38]65}。因此，霍尔将意识形态视作一套生产意义的规则，即它定义了社会行动的情境。霍尔认为意识形态：“在个体之前，它构成了个体得以诞生的部分特定社会形式和情境。我们不得不‘借助意识形态来言说’，因为它在我们社会当中极为活跃，并且它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社会关系和自我处境的工具……它通过为身份和知识构筑主体(包括个人和集体)位置来‘起作用’，而身份和知识能够让主体‘发出’意识形态的真理，这就好像他们正是这些真理的原创者一般。”^{[40]31-32}

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意识形态话语当中将不明事理，正如霍尔指出：“遇到一种意识形态陈述之时，我们自身无法察觉这种意识形态分类的系统规则。”可是，按照结构主义以及阿尔都塞的观点来看，他维持了这种意识形态，“就像语言的规则……容易通过解释和解构模式进行理性的审查和分析，这可以对其根基切开一种话语，并且允许我们检查产生它的各种类型”^{[41]106}。

这一蓝图始于如下假设：脱离语言或者意识形态的结构是可能的，确定他的构造原则，摆脱它为我们所有人构筑的实际意识。它假设一个人既能“内在于”(被决定)也能“外在于”(超脱于)这种结构，因此这就能够刺穿话语的生成“基础”。恰恰正是生成基础这个概念——这是一个带有“中心”和“外缘”的结构——自从德里达解剖了索绪尔语言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以来，后结构主义开始持续侵蚀这种结构。由于这种后结构主义的批判来袭，文化研究所致力于的唯物主义(比如马克思主义)就必然面临倾覆。借助葛兰西，霍尔试图规避马克思主义或者“完全相反的另一端”^[42]，但是最终不能逆转这一“无法停止的哲学危机”^{[41]94}，而这恰恰是因为他已经接受了结构主义的基本原理。

葛兰西转向：文化研究范式的综合

“如果说 20 世纪 60 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的主要特色是‘阿尔都塞主义’，那么如今完全可以说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葛兰西主义’。”^{[43]1}

在介绍葛兰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时，香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认为葛兰西复兴——“随着 1968 年事件发展而来”——显示了左派知识分子的一种从悲观主义到乐观主义的转向，而这些左派人士早年曾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上，如今他们展望“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革命转向的可能性”^{①[43]1}。霍尔也置身于这种铸就了 20 世纪 80 年代转向的洪流当中。当阿尔都塞遭受到来自朋友和敌人的理论攻击之时，文化研究开始转向了葛兰西。^②

在“文化研究及其中心”，霍尔认为“葛兰西纠正了大量反历史的、高度的抽象形式，而这是结构主义所处的理论操作层级”，并且这“对我们来说提供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的‘极限’案例”^{[26]35-36}。葛兰西与文化主义同样是彼此相容的。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霍尔认为文化主义的重点是“意识斗争发展的积极方面……反对结构主义范式的不断沉沦”，而对此起到进一步推动作用的就是葛兰西，他“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大量与‘无意识’有关的更为精妙的术语，并且以一种更为积极而有机的意识形态形式给出了文化的‘常识’范畴，而这具备一种干预常识领域的能力……进而组织大量的人。”^{[26]69}因此葛兰西是对于阿尔都塞进行批判者的一剂良方，它是一座通往文化主义之桥，并且这或许超越了那种将文化研究的未来引入歧途的可能路径。

吊诡的是，霍尔的葛兰西转向竟然是遭受了阿尔都塞的刺激使然。在《读资本论》(Reading Capital)一书中，尽管阿尔都塞将葛兰西视为一位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无法忍受他被历史主义所玷污的形象。通过用黑格尔主义的刷子对葛兰西进行着色，阿尔都塞暗示人们只能在葛兰西和他自己当中二者选一，决不能鱼和熊掌二者兼得。霍尔恰恰反对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方式。在《政治学和意识形态：葛兰西》(Politics and

① 文化研究中心的科林·默瑟(Colin Mercer)翻译了墨菲(Mouffe)的这篇导言。

② 比如可以参见朗西埃、赫斯特(Hirst)以及汤普森的相关论述；德沃金(Dworkin)指出阿尔都塞在英国文化研究领域的统治力于 1978 年“已经出现了衰退”(232)。

Ideology: Gramsci)^{[44]45-76}一书中,霍尔、鲍勃·拉姆利(Bob Lumley)、格雷格·麦克伦南(Gregor McLennan)挑战了阿尔都塞的观点。与阿尔都塞的上述对立观很不相同,他们认为:“总体而言,葛兰西扮演了一个生成角色,并且他在相关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品当中处于崇高地位”^{[44]57}。将葛兰西视作阿尔都塞的一位先驱都是考虑到他们二者的共通性:二者都反对经济主义,强调上层建筑的重要性,认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角色在于生产“常识”,并且二者都以政治干预为己任。霍尔和他的合著者认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葛兰西的相遇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最为重要的相遇之一”^{[44]58-59}。此后,葛兰西与阿尔都塞扮演了携手步入文化研究领域的原创思想殿堂的双星角色。

霍尔坚持认为“完全正统形式的阿尔都塞主义……根本没有在文化研究中心存在过”^{[26]35},并非反对这个观点,但笔者认为霍尔早期运用结构主义,尤其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就决定了他与葛兰西的遭遇,并且随后还要对后结构主义作出回应。^①将葛兰西引入原结构主义(protostructuralist)意味着他的关键概念能被整合进已然接受的结构主义原理当中来,这便是霍尔利用葛兰西思想所要进行的首要工作。带着阿尔都塞主义的问题式进行研究,霍尔、拉姆利和麦克伦南将葛兰西的社会形态概念的特征描述为三种层级: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反映了阿尔都塞的范畴。对于这两位理论家,他们认为,经济决定了“最后的审判”,政治和意识形态层级具有重要的自治性。霍尔等人认为政治层级等同于“市民社会”,这是“包括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方面在内的中介范围”^{[26]47},然而意识形态层级,单独的上层建筑,“有助于巩固和整合……阶级和阶级部分进入主从位置”^{[26]48}。与阿尔

都塞将社会形态视作一种“结构的复杂总体”的概念一样,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也“认为社会形态存在着不同层级并且它们可以进行组合”^{[26]49}。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区分与霍尔类似,并且契合葛兰西的“常识”和“系统思想”(或者“哲学”)这组概念,这可以“将良知和阶级本能……转化为一种连贯的社会主义观点”^{[26]53}。他们也将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概念描述为“一种认识论的和结构的问题”^{[26]46},因为阿尔都塞有意识形态“质询”社会主体这一概念。正如“理论实践(theoretical practice)”是阿尔都塞揭露意识形态的关键,葛兰西似乎在暗示激进知识分子通过运用“系统思想”来对“常识”进行去自然化(denaturalize)。^{[26]50}

就像在他之前的阿尔都塞一样,葛兰西也被附加到了霍尔反对还原主义的改革运动当中。在“文化研究及其中心”,霍尔认为葛兰西的作品“代表了一种对任何还原主义形式的持续抵制——尤其是反对这种经济主义”。^{②[26]35}

霍尔最关注的是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这被视为“阶级争取权力的领域”^{[45]47}。这是“位置的战争(war of position)”,知识分子的中心性就是夺取这种领导位置;而霸权“在文化研究领域扮演了一种开创性的角色”^{[45]35}。在霍尔的借用下,霸权被定义为“在一个特殊的斗争场所上所取得的(暂时的)统治权,该领域的接合趋于创造一种社会及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认同当下的国家历史任务的情形”。但是这一进程的最后出现“时常取决于各种力量关系的平衡”,霍尔认为霸权概念“摆脱了葛兰西思想当中的所有宿命论逻辑的踪迹,避免了从一些具体化的经济基础当中‘读取(read off)’政治和意识形态结论的一切诱惑。”^{[45]36}人们认为葛兰西的还原论色彩没有阿尔都塞强,而原因在于前者强调了“意识形态斗争”。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通过与符号、兴趣、主

① 厄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1977)对霍尔理解阿尔都塞并转向葛兰西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也是个人的;在《艰难的复兴之路》(The Hard Road to Renewal)一书中,霍尔指出:从1982年到1984年,他参加了一个由拉克劳组织的讨论小组,该小组“围绕扩大的‘霸权’概念以及当今局势分析的广阔主题”(160)进行研讨。霍尔的撒切尔主义分析——他将其特性描述为一种将大众的“常识”绑定到一种保守政治经济学议程的霸权活动——其形式接近拉克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一文中的庇隆主义解读。霍尔有关撒切尔主义的许多作品首次刊载于《今日马克思》(Marxism Today)和《新社会主义者》(The New Socialist),后来它们被收录于《艰难的复兴之路》以及与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合编的《新时代: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变脸》(New Times: The Changing Face of Politics in the 1990s)之中。

② 在这里霍尔遵从拉克劳与墨菲,后者将拉克劳介绍给葛兰西,并且拉克劳还与墨菲合著了《霸权和社会策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一书。

体、阶级以及社会形态各层级的“捆绑”、“黏合”产生作用,据此霍尔提出葛兰西让文化研究搞懂了某一意识形态是如何“‘积极地(positively)’介入到大众思想当中的,进而重组旧元素、增加新元素,或者通过设定发展边界来‘消极地(negatively)’介入大众思想当中”^{[45]50}。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结合意味着文化研究应当关注“语言和话语当中的意识形态的‘接合’(articulation)”^{[38]80}。

“接合”成为了霍尔通过综合葛兰西和阿尔都塞来重铸两种范式的关键概念。因为吸取了结构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接合成为事物形态的结构原则的规约,它决定了元素是(比如能指、所指、符号、推理命题或者意识形态命题、社会形态层级,等等)如何区分并组合的。这个过程是“任意的(arbitrary)”,因为这些元素并没有一种先在的实质意义,而是通过接合过程来获得相对意义。在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葛兰西进行熔铸之时,霍尔对接合概念进行了重要的修订。霍尔保留了将意义视作关系的和任意的结构主义观点,他将接合定义为“能够将两个不同元素在同一种情景之下进行结合的连接形式。这永远不是一种必然的、决定的、绝对的和必要的连接……一种话语的‘整体’确实是不同元素之间的接合,而这些元素也能够以其它不同方式进行再接合,因为他们并没有必然的‘归属感’。这个‘整体’涉及的是在接合话语和相应社会力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连接,但是并非是必然的连接。”^{[46]53}

可是,不像阿尔都塞将接合当作一种结构的运作那样,霍尔将其再构为一种参与到意识形态斗争当中的社会主体活动。因此,他认为“意识形态斗争发生和转化的某种方式是通过不同元素的接合进行的,因此生产一个不同的意义:打破它们在当下被固定的意义链条。”^{[40]31}

在霍尔看来,这种意识形态的再概念化帮助文化研究者理解“各种思想是如何掌控大众的头脑”,从而让历史集团“维持其统治和领导权”,并且“让大众对于自己的臣属地位心悦诚服。”这同样也解释了“新意识形态是如何兴起的……进而指引大众采取历史行动来反对主导系统的。”在

这种知识的武装下,文化研究能够“理解并控制这个斗争领域”^{[40]29}。由此观之,挑战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涉及分辨它的“接合原则”或者构造规则,以便重组其元素并且揭露这种表面自然的整体的结构性(constructedness)。因此,霍尔设想了一种“理论获知的政治实践(theoretically-informed political practice)”,即辨识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的生成基础从而“引起或者构筑在社会、经济力量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形式之间的接合,这或许能引导大众在实践当中以一种进步方式来干预历史。”^{①[41]95}

然而这个观点在一个矛盾下崩溃了。结构主义有一大前提:个体元素(符号、话语单位等)本身并不存在固有的(实质的)意义,唯有用结构(构造原则)将它们置于彼此之间的关系当中才会呈现出意义。一旦人们接受了这一前提,那么个体们通过替代或者重组各种元素从而产生一种不同的意义则是荒谬的。因为意义常常只能通过结构逻辑来呈现,个体的不同元素的意义任何改变只能通过结构自身的改变来实现。于是问题就成了如何、为什么以及在何种环境下的结构改变。站在一种经典结构主义的立场来看,根本答案则是否定的:结构是一种先验的、无尽的、时时刻刻完整的东西。因此,结构主义反对历时性(暂时发展)、支持共时性(结构的一种序列)。在结构主义范式内,人们或许能辨识出一个给定结构的运作逻辑,但是个体们改变这种逻辑的想法则是不合逻辑的。在霍尔看来,唯有假定认为各种元素确实有一种源自某种东西而非结构形式原则的实质(纯粹形式)意义,那么个体能通过对部件的重排来介入意识形态当中才会有意义。也就是说,他不得不求助于结构(语言、话语、意识形态等)的一种“外缘(outside)”,而这可以促进意义的不同的实践变化。正是“外缘”这个问题使得结构主义和霍尔都试着去熔铸葛兰西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在《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一书中,德里达对结构主义以及结构主义语言学发动了最后一击。他刷新了索绪

① 格罗斯伯格和斯莱克(Slack)明显接受了对意识形态斗争的这番理解,他们将其特征描述为“在一方面——通过创造或者构建这些赞同权力的特殊属性的‘整体’来接合意义和实践;而在另一方面——破坏或者‘脱离’这些构建的整体并且再建构一个在实践和经验之间的另一种凝聚点,即它能使权力和抵抗的另一种布置情况得以浮现并赋予权力”。(90)

尔语言学的基本问题:它的结构概念是一种闭合分类(closed taxonomy),并且相信研究者可以通过外部调查来理解这种结构的整体。德里达认为这种结构的整体原则(构造原则)既不能从外部也不能从内部来寻求。假如意义的整体源自外部(即某个外在观察者可以观察到的),那么它就可以没有意义,因为意义是通过系统当中的各元素的不同关系来定义的;相反地,假如整体原则在结构内部,那么其意义则由系统中的所有其它价值之间的差异来决定的,并且它无法成为那个系统的整体原则。然而德里达接受索绪尔的“符号的一种差异接合的概念”,但是他反对“这种接合发生在理论范围和闭合系统内的观念”^{[47]25}。因此他总结道:一种结构无法通过某种整体法则来组织成为一个闭合系统;它必须永葆开放,不打上某种基本原理或者一种“外部”视角,并且“从属于无限的变化”^{[47]25}。因此德里达判定认为结构主义的错误在于将自己想象为一种非常超验的形而上学。这便是后结构主义批判观点的关键所在,不仅针对结构主义,而且针对所有需要一种基本(形而上学的)原理的思想系统,比如上帝、自然、“人”、结构或者生产力。

这种批判的后果就是整个人文科学的渐进失稳,这其中也包括文化研究。在《意指、表征、意识形态:阿尔都塞和后结构主义论争》(Signification, Representation, Ideology: Althusser and the PostStructuralist Debates)一文中,霍尔对后结构主义做出了回应,他希冀拯救他对于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综合,并且避免滑出了马克思主义。他重申了他对于“正统(classical)”马克思主义的拒绝,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形态层级与其它层级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对应关系。他也批评了自己曾经的一些错误认识,比如他误解了后结构主义的“这里‘没有必然联系’的宣言”,以及“确实没有什么东西与其它东西有联系”的含义。^{[41]94}霍尔用一种“没有必然关联”的“第三立场(third position)”来反对它们,即认为“没有一种规律可以保证阶级意识已然明确地出自于或者符合于某种立场,而这种立场受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关系的制约”^{[41]94}。他承认德里达“正确地指出了能指常常处于不停地滑动当中,这是一种持续不断的‘顺从(deference)’过程”^{[41]93},但是霍尔也坚持自己的“‘不做保证(no guarantee)的宣言……也暗示这里也没有必然的非关联(non-correspon-

dence)”。因此,霍尔指出:“这是不做保证的,在一切环境下,意识形态和阶级决不能以任何方式接合起来或者在阶级斗争当中产生一种自觉的‘集体行动’的社会力量。”^{[41]94-95}霍尔谴责后结构主义用差异抑制“整体”的做法。在他看来,意指在理论上是差异的永恒运动,但是在实际当中它必然会被构造整体或身份的运动所打断:“不带有一些任意的‘固定(fixing)’,或者我所谓的‘接合(articulation)’,这根本就没有意指或者意义。但是什么是意识形态,它恰恰就是通过选择和重组一系列等值从而建立起来的固定意义。”^{[41]93}

针对霍尔对后结构主义的不当理解,或许德里达真的无法容忍一丝一毫。这也暴露了霍尔在试图嫁接结构主义(通过阿尔都塞)和文化主义(通过葛兰西)上的根本缺陷。从结构主义来看,霍尔接受了一种将意识形态视为某种正式结构的观点,即认为意识形态锻造各种元素之间的关系,从而一来构建社会主体的意义,二来展现人们与“真实状况(real conditions)”的关系——意义是无法独立于或者先在于这种缝合(suturing)的结构。从文化主义来看,他承袭了意义是社会主体对其生存状态的回应的概念。将这两种范式合二为一,霍尔指出这些相同主体不仅无法认出意识形态话语的接合原则(即“中心”),而且通过有意识地重排各元素来自取消它。因此,通过将结构主义的语言概念与文化主义的人类主体概念进行嫁接,霍尔的“第三立场”拯救了文化研究的基本范式。首先,这两种立场是互不相容的;其次,它们(其中之一或者二者合一)都无法经得起来自后结构主义者的批评。在对这两种范式的早期评估上,霍尔设想认为文化研究可以轻松解决“思维的逻辑与历史进程的‘逻辑’之间的关系问题”^{[10]72}。十二年后,霍尔认为“如何‘思考’的问题,以一种非还原主义的方式,‘社会’和‘符号’之间的关系,将范式问题遗留在了文化理论当中”^{[1]287}。文化研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笔者认为问题在于文化研究的基本范式本身,而霍尔对这两种范式既没能放弃也没能超越。

用自主性反对反映论:保留经济主义

霍尔对于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综合最终解决了这种文化反映论问题,即通过选择这种二元对立——自主性(autonomy)——这样做就保留了那种特有的对立。事实上,霍尔对结构主义的自主表意系统与文化主义的自主表意主体进行了

叠加,然而保留了这种承继于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经济”自主性。这种将语言/文化/符号、意识/主观性、客观条件/经济分割为流散的对象或者领域的做法必然保留经济主义,因为它将经济视为一种自主性的、客观的与自我调节的东西。进一步来说,一旦这些东西被视为一些分离的实体,那么问题就成为了格罗斯伯格(Grossberg)所指出的:“人们是如何思考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实践的形式与结构)之间的这种关系或者联系的?”^{[12]72} 这些领域之间缺乏一种“必然”关系的连接,因而这就需要某种东西来连接它们;而这种东西就是意指/接合。

一旦采取了结构主义将语言视为自主形式的概念,那么霍尔就设想通过语言逻辑来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比如各种元素的形式差异及其再次组合可以破坏已然存在的意义并且创造出新意义。这种意指实践(或者“接合”)的关键是创造一种连接,比如,在阶级与意识形态之间创造连接从而“使得大众……采取历史行动”^{[42]29}。然而,霍尔已经拒绝了结构主义认为语言结构也生产主体的观念,因为这是另一种还原主义形式(一种意识的反映理论),霍尔的理论模式需要主体有点独立性并且不能还原为话语或者条件。正如霍尔指出的:“人们不是文盲……他们知道有些东西涉及他们是谁。假如他们从事一项计划,这是因为这项工作已经内置于(interpolated)他们,召唤(hailed)了他们,并且为他们建立了一种身份。”^{[48]59}

尽管霍尔使用了阿尔都塞式的语言,但是他引入了一种人本主义概念,即主张人类是一种自觉自主的主体,他们的行动力源自于脑中呈现的观点(意识形态)。同样地,这些希望通过形成有力观点(意识形态)来获得社会领导权(霸权)的人们也必然与语言结构及其存在条件是不完全相同的。在阿尔都塞这里,主体被意识形态所召唤是内刻于结构(形式)或者被结构诉说的,但是我们误以为这是在自由选择思考内容;对于霍尔来说,内置与召唤与说服类似。也就是说,唯有这种意识形态与“他是谁”彼此契合,人们才能被这种意识形态所“召唤”,并且他是谁必然是先在于且独立于这种意识形态质询的。在霍尔看来,拉克劳(Laclau)已经“拆解了”这种“观念的阶级测定”^{[42]39}的任何概念的有效性,因此他驳斥了人们“不能取消也无法磨灭地被刻上了他们应当去思

考的观念”或者他们“应当具备”与其社会形态的立场相符合的政治观念。^{[41]96} 因此,霍尔主张:“在立即的实践意识或者一般人的常识与他们可能成为什么之间必然存在一段距离。”^{[46]52} 因此意识既不是条件给予的,也不是语言给予的——它与二者的关系是偶然的,因为主体性的一些残余时常会超出其测定。

这个偶然主体与符号的偶然性结合起来:因为“在本质上来看,语言与其所指并不是固定在一对一的关系当中的”;“表面上看起来一样的关系或者现象却能够建构出不一样的意义来。”^{[42]36} 语言的不断“滑动”妨碍了其全面限定主体的能力;语言的不稳定性与主体结合排除了它们天衣无缝的可能性。偶然性也扩展到了社会条件领域:“在一种社会关系或社会实践的条件与呈现它的不同方式之间‘没有必然对应’的关系。”^{[41]104} 既然语言、主观性及社会条件的一切必然的、内在的关系是缺失的,那么它们之间的其它任何连接都是外在的,并且必然勉强创造出一种驱使人们“应当具有”某种观念(以及政治理念)的观念。用霍尔的话来说:“通过生成浓缩着一系列不同内涵的话语,不同社会集团的分散的实践条件可以有效地将这些社会力量聚合起来……从而能够成为一种干预性的历史力量”^{[41]104}。

自发主体(autonomous subjects)概念可以通过在条件与意识之间以修辞方式锻造一种契合从而转化成为一种社会力量,这个概念反映了霍尔对后结构主义的基础主义批评的明显让步。不过,我认为霍尔通过将这种批评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从而犯了一个常见误解——而不是后结构主义——的基础主义观点。菲利普·伍德(Philip Wood)将现代主义立场与后结构主义对任何存在基础或者“根基”的批评进行了对比,结果他认为现代主义将基础主义视为“自我或者自主立法的对立物”(换言之,自我是上帝、自然、理性等的外在立法)。而在后结构主义看来,“‘自我’的特殊理念、‘自主性’,甚至表面上反基础主义的诸如‘结构’的概念,它们都明显旨在粉碎自我概念,都有一个隐秘的基础假设在起作用。”^[49] 为了反对这种认为意识是语言的效果或者物质条件的展现的观念,霍尔搁置了一种基于自主自律的现代主义的主体自由观念——霍尔的这种主体与语言及社会条件只存在一种偶然联系,人们能够以接合实践的方式来参与到政治计划当中。^①

假如人们的意识与他们的存在条件之间的任何关联都是借助意指实践来创造的,那么对于霍尔来说这里就明显存在着两种优劣不同的接合方式:一种使得大众趋向挑战主导系统,以一种进步的方式干预历史进程;与上述相反,另一种则是维持“权力集团”的霸权,霸权使得“人们”顺从自己所处的屈从地位。因此,尽管在符号、主体和环境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这里存在一个政治优先问题,这是文化研究求索的目标。一种休谟式的保守主义和相对主义回应了语言、意识和条件之间的这种纯粹任意关系,支持者包括了罗蒂(Rorty)、利奥塔(Lyotard)以及菲什(Fish)等人。鉴于霍尔倾向马克思主义立场,因而他反对这种相对主义者的抉择。但是霍尔断言将这些领域进行接合存在着进步和倒退的不同方式,这就假定了一个可以作出判断并吸引“人们”介入历史的基础。换言之,霍尔需要一个先在于任何特殊接合的“真理(truth)”。这个真理就分别存在于霍尔解释的“存在的真实状态”、“社会形态”、“社会关系”、“主导系统”、“结构”、“经济”等概念当中,而他坚持认为这些东西独立存在于符号表征或者主观经验之外:“社会关系确实存在。我们就在其中诞生。它独立存在于我们的意愿之外。它们真存于其结构和趋势当中。我们无法在不以某种方式将这些条件呈现给我们自身的情况下就进行某种社会实践;但是表征并没有彻底展现其作用。社会关系独立存在于心智之外。然而它们只能被概念化于思想及头脑当中。”^{[41]105}

拒绝了“社会关系能给予我们一种用以感知与思考问题的明确知识”的观念,霍尔主张我们无法接近“在其文化及意识形态范畴之外的某种特殊社会的‘真实关系’”^{[41]97}。这种新康德主义构想似乎赋予了表征手段的决定地位;的确,这是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对于阿尔都塞的一种批判,他认为这只是反映论的变种罢了:“我们可以毫不过分地认为一旦任何自主性屈从于这些表征手段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表征手段决定了表征本身。”^{[41]95}作为对这种批判的回应,霍尔认为赫斯特无法领会“自主性与相对自主性

(relative autonomy)之间的差异”。就霍尔而言,前者导致了“所有事物之间的绝对自主性的理论”,然而后者允许人们形成“一个不是简单的或者还原主义的‘整体’”的概念。^[50]然而尽管后者假设一切事物之间存在一种“相对自主性”,但是人们仍然回避了它们的关系与整体的本质问题。在1977年,霍尔将这个整体定位在“经济结构”领域,在他看来,马克思已经构思了“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还原主义的‘决定’概念”^{[41]58}。霍尔相信,如果不这样就会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地形学’”,而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边界极限”^{[41]59}。

因此,表征与主题之间依据这种基础接合出了一种暂时的关联,而这种关联最终回返到了经济基础,而这里呈现了霍尔的经济主义表象,尽管他一直抨击经济还原主义。^②在工作开始之前,霍尔对于“还原主义”的阐述为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保证。霍尔对“被历史规律保证”^{[46]58}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这是霍尔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作品当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而这充当了文化研究的“他者”角色——这是文化研究领域旨在克服的问题。的确,霍尔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表明经济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某个特殊领域,并且没有哪一种超出文化研究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可以超越斯大林主义的禁锢(阿尔都塞是个例外,但是他也被其它的错误所折磨;当然,葛兰西亦是如此)。没有哪一个含意是准确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哪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卢卡奇在内)持守这种“机械马克思主义(automatic Marxism)”的观点。事实上,他们的各种研究恰恰是在有意识地反对这种机械马克思主义,一些西方毛主义者也是如此(比如法国毛主义者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与查尔斯·贝特尔海姆[Charles Bettelheim]),他们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决裂恰恰就是反对其经济主义的生产力主导。^{[51]53-80}有人或许会在这些思想家的作品的其它方面存有异议,他们甚至在这些思想家的作品中发现了经济主义的踪迹,但是也不能因此就谴责这些思想家是将历史视为

① 史华慈(Schwartz)提供了一种对于自主个体的文化研究的固化以及由这里暗含的个人主义倾向所产生的有限政治概念的有趣批评。

② 这个观点似乎反驳了许多指责霍尔低估了经济的地位的批评家(比如 Garnham; Jessopet 等人; McGuigan; Sparks)。然而,屈服于经济主义与对明确的经济问题缺乏关注并非相互排斥的两个范畴。

某种铁定的经济规律的展现。

进一步来说,这种认为经济主义专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忽略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的历史。贝特尔海姆对于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它“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前提内部自寻烦恼”^{[7]20}——呼应了马克思的经典政治经济学批判。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旨在揭露位于自由政治经济核心的经济主义:“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以及导致它将自身直接呈现为受到经济掌控的逻辑,而经济占据了社会舞台的中心,它的不断铺展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其它维度的发展,而社会看起来不得不根据这种需求来对自身进行不断调整。”^{[52]5}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建立在将资本主义理解为生产能力的自然累加的基础之上,它是供需“法则”的必然结果,它是人类本性的社会展现,也就是说,它所涉及到的个体是作为经济人的、自利天性的个体,他们是寻求“将自身满意度最大化”的竞争者。^[53]经济主义绝非专属于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它是资产阶级经济学领域当中的主导阐释模式。阿明将经济主义称为资本主义本身的“主导意识形态”,这其中的“经济法则被视为一种将自身强加于社会的自然力量的客观规律……成为了一种尤其是外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力量”^{[52]7}。也就是说,经济被当作一种自发的、绝对的、自主的力量、事物或者体系。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将自身视为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的同时恰恰固守了经济主义这个概念。这种将社会关系、意识和上层建筑理解为生产力的反映的观点与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将经济视为其它社会表演的“中心舞台(center stage)”的观点彼此对应。

就这方面意义来看,霍尔对还原主义的批评集中在文化反映问题,但并没有质问这种将经济视为绝对外在力量的一般概念,他也保留了经济主义。在《无阶级感》(A Sense of Classlessness)这篇早期涉及文化与“非文化”之关系问题的文章中,霍尔批评了上层建筑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解释”,主张精炼经济基础概念,并且呼吁我们对二者关系进行一种“自由解释”^{[54]27}。可是,霍尔对二战之后的英国的分析直接定位在了经济主义框架当中,这完全打上了意识和文化的反映论烙印。他提及了“社会生活形式的转变”,并且认为

这种变化可以体现在“作品的韵律与属性”、“技术变革”以及“消费品的数量增加”上。^{[54]26}在霍尔看来,这些因素在客观上已然改变,而在“主观上,也就是,当它们将自身呈现为劳动人民的意识”^{[54]27},因此显示在“新‘阶级意识’”当中就是“引起了一组不同的情绪反应”^{[54]28}。因此,表面上在经济基础领域的自我推进式改变就被反映在了主观性领域了。正如霍尔所言:“技术基础的转化已经发生作用……生成方式的发展必然逐步提升人类意识的层级,并且或许能逐步在所有人类行动领域创造更大的参与需求——‘生产的社会关系’与工作密切相关。”^{[54]28}

这种自下而来的需求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因为这种“以消费为基础”^{[54]29}的新资本主义形式已经创造了一种“阶级混乱的总体感……导致了劳动阶级人民产生了错误意识”^{[54]30}。因此,霍尔警告道:“用物质和技术方式来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几乎是可以掌控的……但是总体来看,人类结构、社会道德关系与其则是完全矛盾的,它与我们的物质进步几乎是背道而驰。”^{[54]31}

尽管霍尔肯定会反对他早期的还原主义分析思路,但是此问题的提出有力地构建了此后三十年的文化研究蓝图: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经济/文化)的关系;文化与非文化的关系、意识与条件的关系;为何工人阶级(或者说“人民”)没有/不能/不会认识他们自身的统治问题;批判知识分子可以对此做些什么的问题。霍尔进行了一场穿越结构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葛兰西的思想历程,这为他提供了许多新的分析概念和方法,沿着这条道路性别和种族成为了新增的分析领域,但是霍尔的原始问题依然延续。因而确实出现了这种将经济(或者资本主义)视为绝对的——一种自我驱动的力量或者事物的趋势。霍尔将这些术语的内涵改变为文化和意识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在“阿尔都塞时期”的创作过程当中,霍尔通过将政治和意识形态构思为相对自主层级来反击还原主义,这种相对自主层级是指它们的结构、效果和“存在条件”都“不能还原为‘经济’”。可是,霍尔继续将它们视为线性关系,换言之,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经济都先于其它层级。他认为“政治、司法和意识形态是有关关系的,但是又是‘相对自主’的实践,因此不同形式的阶级斗争的场域,它们自身的斗争目标,显示了一种对于‘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的反作用力。”^{[50]56}

上层建筑层级的自主性对于“我们已经普遍认定为‘经济’层级内的效果”具有促进作用,^{[50]56}但是经济仍然占据优先地位。它作用于其它层级的效果是最基本的,其它层级则是次要的和“反作用力的”。也即是说,政治、意识形态和司法并不创造经济——经济似乎是自我生成的——但是唯有在事后作出回应。

九年之后,经过了这种葛兰西式的迂回路线,尽管霍尔声称可以给出一个崭新的、非还原主义的确定性,但是经济概念仍然得以延续。在《意识形态问题:不作保证的马克思主义》(The Problem of Ideology: 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一文中,霍尔指出“人们存于其中的关系是‘现实关系’,而人们使用的范畴和概念可以帮助他们在思想当中理解并接合这种关系,”但是“经济关系本身无法规定一个单一的、固定的、不变的概念化方式”,因为“它能够在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当中进行表述。”^{[42]38}假如工人阶级接受这种将“市场”描述为一种“现实的和实践的自利驱动系统”^{[42]34},这是一种表征的结果。因此,“一个只有通过‘公平价格’和‘公平薪资’这些范畴才能生活在资本主义生产循环当中的工人并不会被错误意识所困扰,而是被“不充分的”知识框架所阻碍。用霍尔的话来说,“这里涉及到她不能理解自己正在使用的思维范畴之类的情况”^{[42]42}。

霍尔也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换过程”的各种话语“将我们归为各种社会因素……也为我们给出了各种明确的身份”^{[42]39},这里他冒了将表征方法绝对化的风险。霍尔主张通过一种“充足的”或者“理论的话语”来了解这种“真实关系”从而回避了这个问题,因此暗示了在语言、条件和意识之间存在各种真实的对应关系。这种充足话语来自何处?对于霍尔来说,它们最终是经济赋予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经济方面具有真正的限制与约束性效果(即决定性),而生产循环的各种范畴则被进行了意识形态地构思,反之亦然。经济提供了在思想上将被使用的各种范畴的全部剧目。经济所不能做的(a)则是为某一特定时间的某一特定阶级或集团提供他们的特定思想的内容,以及(b)永远固定或者保证哪一种思想会被哪一个阶级所利用。因此,经济对意识形态范畴的决定作用只能表述为前者为后者限定了运作领域,建立了思想的‘原始材料’。物质环境是约束条件、‘存在状况’的集合,这可以用于

对社会进行实际的思考与算计。”^{[42]42}

因此,霍尔采取形式重于内容的方式将他的经济决定概念与反映论区分开来——这是结构主义的解决方式。通过给予经验的“原始材料”(这里视为思想的分类图式),经济(即“物质环境”)决定了思考可能达到的边界(或者构造原则),虽然我们无法命令任何一个既定存在者的实际思考内容。因此经济仍然作为一种先于思想与行动的绝对的外部原因。的确,霍尔认为阿尔都塞那不幸的“经济最终决定性”能被“经济最初决定性”所取代,因为“没有什么社会实践或者关系集合能够在它们自身所创造的固定关系的决定效果之中自由流动”^{[42]43}。在将霍尔的《无阶级感》与他对20世纪80年代的撒切尔主义的分析进行比较之时,我们会明显发现思路的延续与转变并存,而这在新时代计划中达到了高潮,即阿尔都塞、葛兰西和拉克劳的综合之处,而这种涉及“没有必然联系”的论文也俯拾即是。在《艰难的复兴之路》(The Hard Road to Renewal)一书中,霍尔重申了“在阶级立场、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倾向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的观点。大多数人不得被‘制造’和被‘胜利’——而不是被动地反映。”^{[55]281}阶级不再是一种组织性修辞,不再是一个大体上给定的阶级决定意识的失信概念。工人阶级和统治阶级被拉克劳以理论上的“人民”对“权力集团”这一无组织性的概念所取代。错误意识也被抛弃了——被“身份”所篡夺——因为意识取决于我们“存在的真实情况”是如何接合的。同样人们的利益取决于一定社会条件下的存在立场,因为“社会利益是冲突”的,并且必然会被霸权计划所整编。^{[55]281}

不过,这种差异掩饰了霍尔将经济视为一种自我立法的基础当中所蕴含的一种重要的连续性。在他们介绍新时代之时,霍尔和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认为新时代计划超出了“世界已然改变”的事实,即“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正逐渐呈现出多样性、差异性和碎片化的特色,而不是同质性、标准化,并且经济和组织的规模呈现出现代大众社会的特色”^{[56]11}。“新时代”是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的结果,其特色是“在大规模生产的旧装配线上诞生了‘灵活的专业化’。最重要的是,正是这个东西正在精心安排并持续推动着这个新世界的进化。”他们认为这个转变是“划时代的”——与19世纪的“从‘创业期’到发达或组

织阶段的资本主义”篇章相比,这“已经明显而决然地将这个社会和文化重心移动到一个新方向。”总而言之,“后福特主义处于改变的前沿,它逐渐设定了这个社会的基调,并且提供了文化变迁的主导节奏”^{[56]12}。这并没有远离霍尔在1958年的宣言:“技术基础的转变已然发生了作用。”在这两种情况下,经济按照自身的意志兴盛起来,而其它所有东西(文化、意识和政治,等)则是对这个外部动力的反应。

这种经济概念也贯穿在霍尔在20世纪80年代有关种族、族性和全球化的许多文章当中。在1989年的两场讲座中,霍尔指出了全球化当中的一对张力:均质化(同一性)与特异化(差异性)。尽管霍尔反对将阶级视为一种“控制概念(master concept)”^{[48]46},并且他将自己摆在了一个反对这种“单一逻辑的资本主义运行观”的立场上,^{[57]30}霍尔保留了一种将经济(即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外在的、自动生成的力量的观念。这里资本主义被视为一种东西——几乎是一种按照其自身逻辑和意志行动的主体:“资本主义不断挖掘劳动力的不同形式。”^{[57]30}“为了维持其全球位置,资本不得不去洽谈……去合作并且部分地反映了它不断试图去克服的这种差异”^{[57]32}。“我们越是了解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我们越能理解……沿着奔向一切都是商品之路,这当然也是资本主义的逻辑之一,它是资本主义逻辑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它通过特异化起作用。”^{[57]29}

在这个构想之内,资本主义是外在于和先在于思想、话语、实践和社会关系的。换言之,这就是某种类似自然力的东西,人类在事实之后对其作出回应,而不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历史决定系统,据此我们平时通过我们的实践活动生产和再生产我们生存的条件以及我们自身。霍尔的经济观恰恰持守了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反映论与它们完美兼容——经济(或生产力)扮演了历史的发动机,而“经济的铺展决定了社会的其它维度,它们似乎不得不去调整自身从而适应经济需求”。^{[52]5}目前来看霍尔存留了这个概念,他用语言、意识和文化的相对自

主性来反对经济决定论。因此,经济力量下降为只担当部分的决定因素,文化则通过采取一种语言的非表征模式得到了提升,并且人类的自由通过复兴这种主体常常超越任何外在立法的现代观念得以恢复。

从后结构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重诉既往

20世纪90年代标志了“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的黎明,这是带有马克思主义问题式的文化研究的一次断裂。讽刺的是,按照霍尔的意思,葛兰西是这种衰落的始作俑者,而葛兰西对文化研究的重要程度“恰恰体现在他在文化研究中以彻底的方式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遗产上面。葛兰西‘取代’马克思主义一举的激进性至今尚未被人们理解,并且或许人们也永远不会将之拿来与我们正在进入的后马克思主义时代进行根源上的考量。”^{①[11]281}

在文化研究领域的理论朝圣之旅当中同样重要的是这种“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它已经“偏离了这种大致由马克思主义奠基的既定道路”^{[11]283}。正如霍尔所言,“理论的重塑,作为一种不得不通过语言和文本的隐喻来质问文化的结果,代表了现在文化研究必须常常定位自身的突破口。”^{[11]283-284}在霍尔看来,早期文化研究的“阶级还原论”倾向^{[1]295}和“文化与符号转换的简单二元隐喻”^{[1]303}已经得到了解决,其解决方法是一种“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元隐喻的改良版本的藕断丝连向一种彻底的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概念的总体理论转向。”^{②[1]297}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的抛弃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转换隐喻”标志着文化研究探讨“条件与意识之间的辩证法”的努力的衰落。的确,霍尔赞同用“多元重音的对话(dialogic of multi-acculturality)”的“隐喻”来取代“阶级对立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class antagonism)”的“隐喻”^{[1]299}。对于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来说,相对自主性已经成为单一自主性;阿尔都塞的“结构主导”概念已经被没有中心和主导的结构概念所取代,并且历史必然性已经在历史偶然性面前臣服。

这种思想的迁移在霍尔写作《现代性的构

① 或许葛兰西在得知自己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使者之时会大为惊讶,乃至很可能会很绝望。

② 因此,霍尔对这种福柯式方法的亲和力与日俱增,他从福柯这里较早维持了一种批判的距离(参见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entre and "Signification, Representation, Ideology")。与此相反,他后来的《西方及他者》(The West and the Rest)全部依赖于福柯方法。

造》(Formation of Modernity) 的导言中显露无遗。霍尔将这本书描述为对那些有助于“转向现代性”的“四种主要社会过程”的检验——“政治的、经济的、社会 and 文化的”^{[58]1}——它们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形构的‘发动机’”^{[58]7}。它们当中没有一个获得了“解释的优先权”，因为它们都对于现代性的诞生都是必备要素。因此这本书“采取了一种多重原因解释”，这反映了它对“目的论”观点(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理论)的抵制，即反对将“社会发展最终归因于某种单一原因：经济。”^{[58]10}用霍尔的话来说，“不像许多早期社会学观点倾向于赋予阶级一种‘主导’范畴的地位，这本书并没有采取一种明晰的等级制度或者优先原因，并且对经济还原主义持普遍的批判态度，因为在还原论中经济基础被假定为历史的决定力量。”^{[58]11}与此相反，《现代性的构造》一书“为文化和符号过程增加了更为显著的分量。”文化被授予了“一种更高的解释地位”，因为它“被视为非反映的，而是现代世界的构成要素：作为经济的、政治的或者社会变迁过程的要素。”^{[58]13}

根据霍尔的意思，这个“关键概念的多元化”^{[58]11}标志着知识的进步。现在现代性被理解为“不同的暂时性”，“遵从非理性逻辑”^{[58]9}，“多元的结果”，以及“不均衡的、矛盾的、偶然性(而非必然性)”的事件。霍尔稍微放弃了这种将历史视为“一系列纯粹的偶然事件”的观点，^{[58]11}“这个形成过程并不是自主的与彼此分离的。它们之间存在各种关联——它们彼此相互接合。但是它们不可避免地聚合起来，都相互合作式地移动或者改变着”^{[58]9}。假如阿尔都塞的幽灵以霍尔的术语继续存在的话，那么这纯粹只是一种霍尔不断将自己与马克思主义隔离开来的幽灵存在罢了，而霍尔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还原主义的烙印。随着后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篇章的展开，经济开始从那些有助于被称为现代性的东西的“四大进程”的中心位置上跌落下来。的确，现代性的“四大进程”，文化，被定义为“社会生活的符号维度”^{[58]13}，这样“社会意义的生产是一切社会实践功能的必备条件”就显得更有决定性了。^{[58]14}

尽管经济的地位在霍尔的新图式里下降了——现在它既不是最初的决定因素也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这并不意味着经济主义的垂死挣扎。霍尔将维维恩·布朗(Vivienne Brown)讨论经济的篇章描述为“被新经济关系决定并被新

经济思想控制和表现的经济生活的独特领域”的一种检验。这个“经济领域”包含“商业和贸易”，“市场和劳动的新部门的扩展，物质财富和消费的增长。”这一切都是“作为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和传统经济逐渐转化的结果”。欧洲的“经济发展”，霍尔指出，“它是由贸易和市场的扩展所驱动的。”“资本主义系统的生产活力”是被“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和私人经济的市场力量”所解放的。这种“发展的引擎是商业和农业的革命”^{[58]3}。

这种语言将经济作为了一种社会主体和社会关系独立运作的事物——的确，就像篇章标题所暗示的：“经济的诞生”同时就孕育了资本主义本身。这类似于我们过去常常描述地质变迁的语言一样。这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语言，即市场和资本主义被描述为是从事物的自然秩序当中自发生成的一样。有证据表明霍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萌芽于封建经济的缝隙之中。”^{[58]8}霍尔将经济描述为一种独特的、自生的领域，它重复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把经济视为“市场”的独立运作，它独立于并且奠定了其余的社会存在的基础。

将经济以这种方式进行构思的结果就是使得经济变得非社会化(desocialize)和非人性化(dehumanize)了。经济与这种叫做“社会”的东西的分离是非常明显的。在他所写的《改变社会结构》(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s)这章里，霍尔认为作者哈里特·布兰得利(Harriet Bradley)“将重点从经济过程转向了变迁中的社会关系，并且新型的社会结构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她所写的篇章关乎新社会和劳动力的性别分离的出现。她比较了前工业社会的阶级和性别形态，新社会阶级在乡村社会中诞生，他们围绕着资本和雇佣劳动被组织起来；工作形式与新形式的工业生产联合起来；也形成了新型的男女关系。”^{[58]4}

在这种构想中，“经济过程”似乎浮现了其自身的协同，然后提供了“社会关系”在其它地方改变的推动力，这也与‘经济’中的自发改变分离开来。

有一个词语可以用来设想这种方式——拜物教(fetishization)——在这里实际人类活动的结果被视为一种超人之物。这恰恰是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标，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从而揭示这种“拜物教的经济世界”，即“劳动和人类生活实践的语言”被转换成了“商品的语言”^{[59]102-103}。借助那个灵巧之手，“劳动的生动现

实”降低成为其“异化的和抽象的形式”(即金钱),资本宣告了它与作为“他者”的人类劳动的“纯粹自主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任务是将这种拜物教世界奉为神圣的事实和理论。正如大卫·麦克纳利(David McNally)所言:“因此庸俗经济学的拜物范畴构成了一个‘自生(self - birth)’的神话……在庸俗经济学之中,资本成为了一个狂暴的尼采信徒,一个贪得无厌的意在否定所有他者的力量,它拒绝承认自己的劳动源出,并且它寻求一切存在条件的根源地位。”^{[59]103}

尽管霍尔并没有宣称经济的“纯粹自主性”——他的四大“进程”自然而然地“在彼此之间发生接合”——然而通过将经济转化为一种独立于政治、文化和社会关系的客体,霍尔再生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和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拜物教世界。而且,霍尔将每一个进程视为不同的“范围”或者“组织的串群”^{[58]11},这就排除了将它们视为一种“复杂整体”的可能性,并且缺乏一种将社会视为相关进程的偶然堆积体的观点。实际上,后马克思主义者霍尔选择一个他曾经明确反对的立场:一种“传统的、社会学的、多元因素的、没有优先决定的方法”,在其中“所有东西之间相互作用”^{[41]91}。

在1973年,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 Marxist Cultural Theory)一文中,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批评了这种非常立场,因为它必须“撤销这种存有一切决定进程的宣言。”^[60]³⁶威廉斯指出尽管自马克思以来的上层建筑概念已经经历了许多次修订,但是“‘经济基础’这个被普遍接受的概念却并没有得到较为匹配的对待”,而这又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概念,假如我们能理解文化进程的现实性。”他指出了这种将经济基础构思为“在本质上非统一且常常是以静态的方式”存在的趋势——实际上将其“视作是一个单方面决定其它事物的客体”^{[60]33}。威廉斯断言这与马克思的原本立场并不一致,后者将决定的起源定位在人类的“特殊活动和关系”上。^{[60]34}

笔者认为威廉斯处在了文化研究试图超越文化反映论的最薄弱之处:它试着通过将所有精力会聚于上层建筑的方式来反思经济基础与上

层建筑的关系,然后再将这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经济基础概念原封不动地搁置一边。通过这种不平衡的努力,毫无疑问霍尔对于反映论的挑战便不可阻挡地移向了上层建筑的自主性方向,然而与此同时也保留了经济基础的自主性。而且,一旦它们被认为是不同的领域,那么这就不可能以经验方式在它们之间建立一种必然的或者自由的关系。相反它们成为一系列客体、事件或者“进程”,它们的关系是外在的和偶然的。它们之间的任何“统一”完全是主观的和传统的——一种特殊“接合”的产物,即暂时打断和“固定”这种无尽的意指活动。通过主张文化的自主性来解决反映论问题,霍尔因此选择一种分析的和新实证主义的——即反对辩证法的——明晰模式,在后者的范围当中并没有一种作为自主对象或事实的事物。^①

没能质疑经济基础的自主性也保留了这种心物对立,而这便撕裂了席勒的批评。在《〈现代性的构成〉导言》一文中,霍尔指出:“经济的、政治的和发展的进程似乎有一个清晰的、客观的和物质的属性。它们改变了‘现实世界’中的物质和社会组织——人们的实际行为是如何的。与此相反,文化进程一般处理无形的事物——意义、价值、符号、观念、知识、语言和意识形态。”尽管他宣称语言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和“物质进程——就像经济和政治——依靠它们效果的‘意义’”^{[58]13},但是霍尔将“物质的”和“推论的”设想为不同的区域,它们之间的关系必须经由分析假定得出,而不是作为辩证的、交互的构成时刻,即威廉斯曾经所言的“一个总体不稳定的实践”^{[5]31}。

二十年前,霍尔曾提出文化研究的未来在于发现一个可以解决“非还原确定性问题”的方法。^{[10]72}他的方法是将这个世界包装成不同的领域,而这些领域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偶然的,因此就是非决定性的。实际上,霍尔返回到了汤普森对“生活经验的原始材料”与“规则和系统”的早期区分上来,但是与汤普森相反,霍尔将它们的关系视为任意的而非必然的。但讽刺的是,这种策略保留了唯心主义和经济主义——这些是现代思想的孪生支柱——使得文化成为思想、语言和意义的专属领域,并且将经济转化为一种无

① 萨特比较了这种历史的辩证考察方法,这种方法将“单个进程的发展总体”当作其对象,这是一种分析的或者实证主义的方法,它“试图展现研究案例中的几个独立的、外在的因素是一种合力”(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15)。

声的、非意指实体的领域。霍尔的理论历程始于无法在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之外反思经济基础问题；自语言学转向以来，即将语言进行分离并赋予其特权，然后再将其投射回整个社会实践。从身边的“原始材料”中自由创造意义的现代主体也开始了复兴。这种轨迹——这使得符号的自主性与主体和经济的自主性彼此竞争——排除了超越经济主义或者唯心主义的可能性。而且，一旦选择将结构主义作为与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抗争的武器，文化研究本身就很容易受到后结构主义对二者批评的侵害。一旦登上了结构主义的列车，无需对经济基础问题进行必要的理论工作，霍尔和文化研究不得不借助马克思主义进行逢场作戏并且“再次完全转向另一边了”^[42]²⁸。

我们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当那些最为著名的实践者公开宣称上述言论之时，文化研究就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立场。或许更为难堪的是文化研究领域因此保留了经济主义——这是它曾试图彻底废止的东西。英国文化研究是20世纪一系列试图构筑非还原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努力当中最近的一例。如同其它既往者一般，它沿着上层建筑之路进入这一理论构筑的计划当中。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也没能批判性地研究经济基础问题，这些努力至今无法让人满意。^①霍尔的理论历程以及在其帮助下变得制度化的文化研究为那些继续投身对文化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的后继者是一笔宝贵的教训。假如我们能从文化研究将自身从经济主义和唯心主义当中解救出来的失败当中学习的话，那么我们或许会回想起威廉斯将文化构思为“一个总体不稳定的实践”的努力。从这一视角来看，“上层建筑(文化)”与“经济基础(非文化)”都不是自主性的。二者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关系的具体总体中的人类实践活动的物质化。意指并不是语言的独特属性，也不是文化的特殊领域，而是人类的实际活动(实践)与这些多样的过去与现在的活动“在事物以及事物的秩序之中”的物质标记，而这必定避开我们每一个人，这为我们所有人构筑了一个客观命令的领域，并且将我

们每一个人镌刻进社会关系的系统当中。^[61]由此观之，资本主义并不局限于一个叫做“经济”的领域。它也不是一个事物、进程或者力量。它是一个动态的、冲突的社会关系的系统，就此来说它时常是一种资源、场域以及意指的对象。假如我们希望理解涉及社会总体性的文化的话，那么我们或许要注意威廉斯复议这种被普遍接受的经济基础概念的呼声，而长期以来人们对这里的经济基础概念缺乏质问。或许我们应该开始发现“文化进程的现状”^[60]³³。

参 考 文 献

- [1] Hall, Stuart. For Allon White: Metaphors of Transformation[G]//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In Stuart Hall. London: Routledge, 1996.
- [2] Dworkin, Dennis.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3] Williams, Raymond. The Long Revolution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1.
- [4] Thompson, E. P. The Long Revolution II [J]. New Left Review 10 (July-August 1961): 34-39.
- [5] Williams, Raymond. Marxism and Literature [M].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6] Williams, Raymond. Literature and Sociology: In Memory of Lucien Goldman [J]. New Left Review 67 (May-June 1971): 3-18.
- [7] Bettelheim, Charles. 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 The First Period, 1917-1923 [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 [8] Higgins, John. Raymond Williams: Literature, Marx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 [M]. London: Routledge, 1999.
- [9] Anderson, Perry.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 [10] Hall, Stuart. 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 [G]//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 Sage Publications (1980).
- [11] Hall, Stuart.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 [G]// Lawrence Grossberg, Cary Nelson, and Paula Treichler.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2: 277-294.
- [12] Grossberg, Lawrence. Cultural Studies vs. Political Economy: Is Anybody Else Bored with This Debate? [J].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2 (March 1995): 72-81.
- [13] McRobbie, Angela. Post-Marx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A

① 萨特是个例外，他的《方法寻求与辩证理性批判》(Search for a Method and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恰恰正在反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公式，并且试图超越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人本主义的局限。萨特的作品对于发展一种非还原主义的唯物主义文化理论是不可缺少的——这是我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探讨的论题。

- Post-Script [G]// Lawrence Grossberg, Cary Nelson, and Paula Treichler.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2: 719-730.
- [14] Sparks, Colin.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Marxism* [G]//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Stuart Hall*. London: Routledge, 1996.
- [15] Smith, Paul. *Millennial Dreams* [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7: 60.
- [16] Schiller, Dan. *Theorizing Communicati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7] Thompson, E. P. *The Long Revolution* [J]. *New Left Review* 9 (May-June 1961).
- [18] Levi-Strauss Claude. *The Savage Mind*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 [19] Barthes, Roland. *Mythologies* [M]. London: Jonathan Cape, 1972.
- [20] Althusser, Louis. *For Marx*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0.
- [21] Jameson, Fredric. *The Prison - House of Langu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101.
- [22] Riordan, William. *Sartre and the Structurality of Structure, or Was Sartre a Poststructuralist?* Unpublished [M]. University of Colorado, 1998.
- [23] Kristeva, Julia. *Language: The Unknown*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 [24] Bourdieu, Pierre.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33.
- [25] Levi-Strauss Claude. *From Honey to Ashes* [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477.
- [26] Hall, Stuart.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entre: Some Problematics and Problems* [G]// S. Hall et al.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1979)*. London: Hutchinson, 1980.
- [27] Angus, Ian, et al. *Reflections upon the Encoding/Decoding Model: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G]// In *Viewing, Reading, Listening: Audiences and Cultural Reception*. ed. Jon Cruz and Justin Lewis, 253-74.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254.
- [28] Hall, Stuart. *Encoding/Decoding* [G]// S. Hall et al.,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Hutchinson, 1980.
- [29] Hall, Stuart. *The Determinations of News Photographs*. [G] // Stanley Cohen and Joel Young. *The Manufacture of News*. London: Constable, 1973.
- [30] Hall, Stuart. *Culture, the Media, and the 'Ideological Effect'* [G]// James Curran, Michael Gurevitch, and Janet Woollacott.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1977: 315-348.
- [31] Hall, Stuart. *Signification, Representation, Ideology: Althusser and the Post Structuralist Debates* [J].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2 (June 1985): 94.
- [32] Althusser, Louis, and Etienne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
- [33] Norris, Christopher. *Spinoza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Critical Theory*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35.
- [34] Althusser, Louis. *Philosophy and the Spontaneous Philosophy of the Scientists* [M]. London: Verso, 1990.
- [35] Dews, Peter. *Althusser, Structuralism, and the French Epistemological Tradition* [A]// ed. Gregory Elliott. In *Althusser: A Critical Reader*, Oxford, England: Blackwell, 1994.
- [36] Althusser, Louis.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1: 155.
- [37] Grossberg, Lawrence, and Jennifer Daryl Slack. *An Introduction to Stuart Hall's Essay* [J].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2 (June 1985): 88.
- [38] Hall, Stuart. *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 [G]// Michael Gurevitch.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London: Methuen, 1982.
- [39] Hall, Stuart. *Signification, Representation, Ideology: Althusser and the Post Structuralist Debates* [J].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2 (June 1985): 98.
- [40] Hall, Stuart. *The Whites of Their Eyes: Racist Ideologies and the Media* [G]// George Bridges and Rosalind Brunt. *Silver Lining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81.
- [41] Hall, Stuart. *Signification, Representation, Ideology: Althusser and the Post Structuralist Debates* [J].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2 (June 1985).
- [42] Hall, Stuart. *The Problem of Ideology: 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 [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10 (summer 1986).
- [43] Mouffe, Chantal. *Introduction: Gramsci Today* [G]//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9: 1.
- [44] Hall, Stuart, Bob Lumley, and Gregor McLennan. *Politics and Ideology: Gramsci* [G]// *On Ideology/Center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Hutchinson, 1978: 45-76.
- [45] Hall, Stuart, Bob Lumley, and Gregor McLennan. *Politics and Ideology: Gramsci* [G]// *On Ideology/Center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Hutchinson, 1978.
- [46] Grossberg, Lawrence, ed.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10 (summer 1986).
- [47] Frank, Manfred. *What Is Neostructuralism?*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 [48] Hall, Stuart. *Old and New Identities, Old and New Ethnic-*

(下转第 54 页)

- 察[M]//王名.中国非营利评论: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 [11] 胥子婷.社区治理的“泰达”之路[J].社区,2010(3)上:10.
- [12] 李友梅.社区治理: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J].社会,2007(2):165.
- [13] 陈天祥,杨婷.城市社区治理:角色迷失及其根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3):130.
- [14] 何平立.冲突、困境、反思:社区治理基本主体与公民社会构建[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 [15] 何海兵.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从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J].管理世界,2003(6).
- [16] 董秀.深圳市“社工+义工”联动参与社区治理的思考[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 [17] 魏娜,崔玉开.城市小区治理的网络参与机制研究[J].教学与研究,2011(6).
- [18] 理查德·C·博克斯.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 [19] 郁建兴,任泽涛.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中的协同治理——一个分析框架[J].学术月刊,2012(8).
- [20] 宋锦洲,等.公共危机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研究[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 [21] 魏娜.我国城市小区治理模式:发展演变与制度创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1).
- [22] 王巍.社区治理结构变迁中的国家与社会[J].公共行政评论,2009(1):200.
- [23] 周健.公共服务社会化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思考[N].慈善公益报,2012-11-16.
- [24] 奥斯本·D,普拉斯特里克·P.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M].谭功荣,刘霞,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4.
- [25] 陈喜强,李军.基层社区组织与政府互动关系视角的政府职能转变分析[D].中国行政管理学年会论文,2005.
- [26] 严志兰.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之特征剖析——以武汉市杨园街道的实地调查为例[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8).
- [27] 王红艳.社会管理创新与社区治理的群众参与[J].重庆社会科学,2011(8):36-41.
- [28] 钱海梅.社会资本:基于信任的资源配置方式探究——兼论社区治理中社会资本的运作机理[J].现代管理科学,2011(2):88.
- [29] 李惠斌.什么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1-12.
- [30] 燕继荣.投资社会资本——政治发展的一种新维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8.
- [31] 吴佳顺.城市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方式研究[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1(6):40.
- [32] 燕继荣.社区治理与社会资本投资——中国社区治理创新的理论解释[J].天津社会科学,2010(3):62.

【责任编辑:胡春燕】

(上接第42页)

- ities [G]//Anthony D. King.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System.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1991.
- [49] Wood, Philip R. A Revisionary Account of the Apotheosis and Demise of the Philosophy of the Subject: Hegel, Sartre, Heidegger, Structuralism, and Poststructuralism [G]//Jean -Francois Fourmy and Charles D. Minahen. Situating Sartre in Twentieth -Century Thought and Cultur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168-169.
- [50] Hall, Stuart. The 'Political' and the 'Economic' in Marx's Theory of Classes [G]// Alan Hunt. Class and Class Structur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7.
- [51] Rossanda, Rosanna. Mao's Marxism [G]//Ralph Miliband and John Saville. Socialist Register. London: Merlin Press, 1971: 53-80.
- [52] Amin, Samir. Eurocentrism [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9.
- [53] Godelier, Maurice.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in Economics [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15.
- [54] Hall, Stuart.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J]. 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 5 (autumn 1958).
- [55] Hall, Stuart.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 [M]. London: Verso, 1988.
- [56] Hall, Stuart, and Martin Jacques. New Times: The Changing Face of Politics in the 1990s [M].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9.
- [57] Hall, Stuart.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Globalization and Ethnicity [G]//Anthony D. King.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System,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1991.
- [58] Hall, Stuart. Introduction to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G]//Stuart Hall and Bram Gieben. London: Polity Press, 1993.
- [59] McNally, David. Marxism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M]. New Politics 6 (winter).
- [60] Williams, Raymond.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G]//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London: Verso, 1980.
- [61] Sartre, Jean-Paul. Search for a Method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156.

(责任编辑:胡春燕)

思想的历程: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以及悬而未决的文化与“非文化”的关系问题

作者: [贾妮思·佩克](#), [宗益祥](#)
作者单位: [贾妮思·佩克\(科罗拉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美国博尔德80309-0065\)](#), [宗益祥\(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00\)](#)
刊名: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年, 卷(期): [2015, 37\(1\)](#)

引用本文格式: [贾妮思·佩克](#), [宗益祥](#) [思想的历程: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以及悬而未决的文化与“非文化”的关系问题](#)[期刊论文]-[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1)